



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主编 吴康宁

走在回家的路上

学校生活中的个人知识

齐学红·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走在回家的路上

学校生活中的个人知识

齐学红·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在回家的路上/齐学红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7-303-07483-X

I. 走… II. 齐… III. 教育社会学-研究
IV. G40-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24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80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02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37.00 元

总序

当今时代，变化之快，快得让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即便是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也不能完全“幸免”。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或许可视为其中一例。

屈指算来，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自1979年重建后的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中，这门学科经历了许多“大事”，完成了许多“任务”。譬如，从本科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开设(1982)，到全国性教育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成立(1989)，再到《教育社会学简讯》的印发(1991)，我们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制度重建任务；从国外教育社会学成果的译介(1979)，到教育社会学重要文选的编辑出版(1989)，再到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教育社会学教科书的问世(1986)，我们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初步完成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工作；从教育社会学方向硕士生的招收(1984)，到教育社会学方向博士生的招收(1989)^①，再到教育社会学方向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1999)，我们也只用了13年的时间便实现了教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层次的“三级跳”；即便是在研究本身的进展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实现了两次所谓的“转型”，即：从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到学科概论性研究与

^①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50页；张人杰：《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20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6)。

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阶段，再到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1〕}……

这一切，来得似乎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那样的有条不紊。但笔者作为部分地参与了这一过程的见证人之一，在体验了资料不充、经费不足、队伍不强、体制不活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的规限等种种困扰之后，却深感其中之艰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重建至今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与自豪。^{〔2〕}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不管我们怎样引为高兴与自豪，上述成绩都已成为“历史”，更何况不论是人也好、学科也好，都必须不断地使自身成为“历史”，因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就在于使自身成为“历史”。这样来审视，我们就不能滞留于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了，而是应再向前推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分支领域性研究中应从以概论性研究为主、具体问题研究为辅转变为以具体问题研究为主、概论性研究为辅。理由至少有三：

第一，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既不是“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也不是“外国教育问题”，而是中国大陆自身的教育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会含有“普遍性”特征与“全球化”色彩。只有对大陆自身的教育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社会学解释，才有可能最终为大陆自身的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之科学化和合理化提供社会学依据，从而体现出这门学科的终极价值。而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不研究自身的教育问题，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身的教育问题^{〔3〕}，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感西方之迹而生”的“印迹式教育社会学”^{〔4〕}。

第二，教育社会学有许多分支领域，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已经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分支领域。对于这些领域来说，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关于”这些分支领域的概论性研究

(其研究成果的典型表现形式便是“××社会学”),而是对“划归于”这些分支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会反过来增进对于这些分支领域的总体认识,促成对于这些分支领域现有框架的反思。而对于尚未建立的那些分支领域来说,其构建工作似也不宜再千篇一律地采取迄今为止通常所见的先推演整体框架、再研究具体问题的做法,而有必要从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逐步形成整个分支领域的框架。

第三,上述第二点主要是从教育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建立与发展的角度来说的,基于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现实水平,通过拓展与深化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来推动教育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甚至对于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今后发展来说也不应当是主要的。其原因便在于,作为教育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具体教育问题本身并非专属于某个特定的“单分支领域”(如“教育文化社会学”、“教育变迁社会学”、“教师社会学”、“学生社会学”等),而是“多分支领域性地”、“跨分支领域性地”存在着的。当然,对于这些具体教育问题,不是不可以进行“单分支领域性”的社会学研究,但其研究结果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境界不是将各分支领域画地为牢,而是应尽可能将这些分支领域打通,以便对具体教育问题作出“跨分支领域的”、“融通的”社会学解释。或许,笔者可将之称为“从强分支领域到弱分支领域”、“从有分支领域到无分支领域”的转换。事实上,这绝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学科发展筹划,而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实践已逐渐显现的一种态势。在这方面,一些青年研究者已经作出了可贵尝试,他们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特定分支领域的边界。

于是,支持与鼓励对于具体教育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持续地展示与传播这些研究成果也就很有必要了;于

是，便有了编写这套《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并借此推动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新世纪发展的想法；于是，收入这套丛书的便不是教育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类教材”的概论性著作，而是对于具体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专著。

感谢北师大课程中心的康长运博士、北师大出版社的刘生全博士！正是他们的理解与热情、耐心与细致，才使得本丛书最终能以较快的速度、较好的面目问世。

吴康宁

2003年1月15日

注释：

[1] 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可以说始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重建之时，即20世纪80年代初；学科概论性研究与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则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9年问世的《教育社会学丛书》（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南京师大出版社）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一个凸显标记。[张人杰：《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20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6）]

[2] 笔者曾在1992年向加拿大一家教育研究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如果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取得同等学术成就的话，那么，中国学者恐怕要比西方学者勤奋得多，也可能聪明得多，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学者的研究条件远不如西方学者。

[3] 有一种说法，认为自己的眼睛常常不能敏锐地发现与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问题，因而必须借助于他者的眼睛。而笔者以为，当自己的眼睛不能敏锐地发现与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问题时，确实可以向他者的眼睛求助，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助的目的也不应是直接地用他者的眼睛来找寻与审视自己的问题，而应是探究形成自己的“新眼睛”的可能性，何况他者的眼睛究竟是否真正适合于帮助研究者形成自己的“新眼睛”，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者的眼睛代替不了自己的眼睛。最终用来找寻与审视自己的问题的，只能是自己的眼睛。据此判断，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不少教育研究其实都并非研究者用自己的

眼睛“察看”出来的结果，而是直接用西方学者的眼睛“审读”出来的产物。坦率地讲，这些研究者其实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新眼睛，故而这些研究也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研究，其起点、过程与结论都颇为可疑。

〔4〕所谓“印迹”，是指一种已成为全球现象的文化影响模式。有学者认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具有这种感迹而生的性质。我们的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写作方式、学术评价体系，绝大多数都是这么形成的”。〔见高建平：《什么样的印迹？》，《读书》，2002（11）〕

导 言	走在回“家”的路上 / 1
	一、研究的缘起：对现实生活意义的追寻 / 3
	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关怀 / 4
	三、基于当下生活的写作体验 / 8
第一章	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论 / 13
	一、理论背景：关于知识社会学 / 15
	二、研究的方法论：实践取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 / 30
第二章	校长和他的学校 / 43
	一、校长对学校的谋划：命名学校 / 45
	二、学校对于时空的构建 / 51
	三、营造宽松的人际氛围 / 63
	四、他者的眼睛看学校 / 71
第三章	研究者和她的课题组 / 75
	一、对研究对象的打量 / 78
	二、学校场域下的课题运作 / 82
	三、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 / 91
	四、实践的逻辑 / 125
	五、研究者的角色意识 / 134

第四章	教师的生活世界与个人知识 / 139
	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较量 / 141
	二、班主任与班级经营 / 152
	三、实践者的智慧 / 174
	四、教师专业成长的代际传承 / 184
	五、教师眼里的教科研 / 187
第五章	学生的生活世界与个人知识 / 205
	一、成人世界的预演 / 207
	二、孩子眼里的世界 / 212
	三、被规训与惩罚的身体——关注差生 / 223
	四、中学生的“另类”生存 / 234
第六章	教学过程中的知识 / 241
	一、文化视野下的学校知识 / 243
	二、教科书宰制下的个人知识 / 249
	三、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 / 285
第七章	世俗化的学校 / 311
	一、家长作为一种教育资源 / 313
	二、家长的被动介入 / 319
	三、来自社会环境与家庭的影响 / 325
	四、家庭与学校关系透视 / 334
	五、学校教育：宗教社会学的释义 / 337
附 录	以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
	——对一个教学文本的解读 / 345
	主要参考文献 / 356

导 言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研究的缘起：对现实生活意义的追寻

这里呈现的是活跃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广大中小学教师，以及一些有志于基础教育研究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追寻着教育教学的生命力及其价值的心路历程。试图揭示：在看似客观公正的知识传输活动的背后，有以往社会学家揭示与批判的权力与利益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实践者对于生活以及生命意义的追求与探索。知识不仅具有认识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生存以及生命的意义。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共同走在回“家”的路上。

——写在前面

一、研究的缘起：对现实生活意义的追寻

“家”是一个人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中追寻的地方。家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存在，它还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学是每个人走出家门的第一站，也是一个新的梦开始的地方。我们都是从这里开始成长、成人的。在孩子们眼里，学校还是一个神奇的世界，这里有同自己一样的孩子，有被比作妈妈一样慈祥的老师，有整齐的课桌椅，有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课本，上面还有各种可爱的图画；有神秘的升旗仪式，有光荣的少先队组织，有统一的校服，还有各种在孩子们看来非常重要的奖励和处罚。在这里，他们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做人。只有经历了学校教育的洗礼，一个孩子才能长大成人。而上学在大人们的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孩子惟一要做的正事，其他的事都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这一切，在成人眼里是那样的天经地义，不容置疑。只有在这里，孩子们才能获得自己的归属感，这里被比作是孩子们的家。从此，孩子们开始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也开始了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漫漫历程。

这里关注的不仅仅是制度化的学校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更

主要的是探讨学校及其学校知识在个人成长中的意义。我相信，同样的教学内容和传输过程，在不同孩子的内心深处唤醒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是不同的。面对同样的“客观世界”和“客观化的知识”，人们的主观体验是不同的，因此，世界总是具体的“你”“我”眼里的世界，而没有一个共同的绝对客观的世界。现实世界总是人们主观上予以建构起来的。人们建构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的过程。“走在回家的路上”试图呈现在学校场域里，在看似客观公正的知识传输活动的背后，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存在，人们对于教育教学，以及生活与生命意义的追寻过程。这里，虽然也有着权力与利益的争夺与斗争，但是更重要的却是人们对生活意义的追寻。知识不仅具有认识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生存和生命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研究者的一项具体的认识活动，也同研究者的具体社会存在密切相关。作为生活中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周围的人有着同样的现实的需求，以及利益的权衡与较量。在研究周围的客观世界的同时，研究者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研究活动本身也需要做尽可能客观公正的审视与打量。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下，普通人的知识和实践活动，与知识分子的知识 and 实践活动并无高下之分，他们共同构建了今天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作为一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本文考察的就是日常教学生活的现实及其建构过程。

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关怀

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也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即什么样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或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主动建构，并建立一定的意义关系的过程。研究者在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在建构着研究者自身。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我中有

二、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关怀

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因为研究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喜好和价值取向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身上。而决定研究者对研究对象选择的依据则可以追溯到研究者的个人生活史。

对于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我来讲，从小受到的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雷锋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已经融化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寻找一个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并为之献身，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和梦想，教育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项事业。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7 岁那年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选择当教师时的激动心情。像父亲一样做一名小学校长，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成就一番事业，一直成为我的一个梦想，并伴随着自己的奋斗历程。我想今天工作在中小学一线的同龄的或者老一辈的广大教师大多也是怀着这样的理想，把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者是谋生的手段。当我在同中小学教师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在谈到一堂堂精彩的课或一个个自己喜欢的学生时眼睛里常闪烁着激动的光芒，那种因内心充满着理想和希望而燃烧的激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而只有同样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情感。这里，虽然也有对个人权力与利益的谋划，长年累月的职业生涯下的倦怠感，但是在他们心中涌动的仍然是燃烧的激情；支撑着这份事业的除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是作为实践者的智慧，以及对于自己生活与生命意义的追求。

作为研究者，所以选择个人生活史作为研究视角，是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的。四年的中学语文教师生活，不仅使我萌生了对教育教学的浓厚兴趣，而且改变了我的专业方向。正是这段“意犹未尽”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小学教师情结”，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一次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并把自己投身到中小学的教学实践中，去做这样一种实地研究，同时也把自己的热情和希望融入了这样一种作为生活方式和研究方式的行动之中。而时隔 20 年以后，当我再次进入中小学现场，我与青年教师年龄上的距

离，使我在这些青年教师身上，更多地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正如吴康宁老师所说，“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你所研究的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你，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你也不再是原来的你了。”这段生活经历，使我与中小学教师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密感，亲近感，因为我始终把自己看作“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走进中小学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作为研究者的我不是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以一种挑剔的目光看问题，而是一种感情上的认同、理解与宽容，是一种设身处地的思考问题的立场与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不知用在这里是否合适？关注他们，就是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生命历程……

在研究过程中，我之所以用“以语文的方式学习语文”^①这样一个题目表达自己的研究发现，是因为在我的学习经历以及几年的中学教师的教学经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关于语文的观念。长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语文教学一直就是字词分析，归纳段意和中心思想，好的文章往往就在教师的科学的理性的分析下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语文学习毫无兴趣可言。虽然我大学所学专业是中文，但是我对语言文字却并无特殊的感受力，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语文教学。这样的经历使我对基于规范的语文教学的现实深恶痛绝，而呼唤一种基于灵性的诗意的教学。注重教学的情感性，体验性，也是我教学所追求的目标。

从个人的研究动机来看，曾经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我，总是试图给自己这样一种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研究经历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潜意识里也有给现在的中小学教师寻找一条出路的想法：也许自己可以作为现在提倡的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一个特殊案例。中小学的教学实践既是自己教师生涯的开端，也成为自己非常熟悉并且乐在其中的研究现场，一走进中小学就产生的“现场感”以及由此激发的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是

^① 见附录。

我在其他的研究场域中从未体会到的。于是，这样一种研究经历和内心体验就成为一种情结，吸引着我一次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另外，对于中小学教师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他们身上，我更多地看到了自己成长的足迹以及往日的自己。这样一种视同己出的情感体验，是那些没有中小学教师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因此，我把自己在中小学做课题看作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作为教师，作为不断成长着的研究者，这里也是自己的梦开始的地方。研究的过程于是成为一个寻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在回“家”路上的心路历程。

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决定了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实践取向。研究者所特有的实践关怀，以及对实践者及其智慧的理解与尊重，使本研究一改一般教育社会学著作的冷峻的批判色彩，为本书的写作定下了一个充满光明的写作基调；二是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不仅对于教学过程中的知识传播活动及其背后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了剖析，更重要的是对于看似客观公正的研究者的研究活动本身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对于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等问题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与批判。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作为研究者的“我”往往是匿名的，隐身的，研究同研究者个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没有任何牵连的，即作为研究者的“我”是不在场的。于是，作为旁观者，他可以做“壁上观”，可以扮演一个客观公正的真理的化身，而这样一种悬置研究者的自我世界及其立场的批判态度是不彻底的、不完全的。在本书中，秉承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立场，在对自己周围的外部世界的分析与批判的同时，对研究者的内心世界也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在写作过程中，当研究者有意识地把“我”置换成“我们”的同时，无形中就扩大了自己的言说力量，从而获得了某种话语权。语言的技巧幻化出的是某种权力的运作与策略的谋划。这就是研究的现实，研究者的生存策略。而对于研究者的知识及其建构过程的分